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王光东 著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王光东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12

ISBN 978-7-5473-0655-0

I.①民… II.①王… III.①中国文学—光学研究—20世纪 IV.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081 号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48×210 毫米 1/32

字 数：217 千

印 张：8.875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655-0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引论 “民间”的概念

在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民间”虽也常被提到，但作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概念，真正引起重视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注重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多元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格局。这一变化还意味着，研究者把以往忽略的一个文学史空间展现出来，这为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提供了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可能。

“民间”概念是由陈思和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他在《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做了系统的阐述。作者主要从1937年以后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探讨“民间”的存在形态、价值和意义。因为它触及对文学史的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及精神重建等重大问题，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导致强烈的争鸣。梳理这一讨论中的各种观点，提出我们对“民间”概念的理解，显然是进一步讨论“民间”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必要前提。

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1. 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程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它毕竟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2. 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

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3. 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因而要对之做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①显然，这一民间概念是在抗战以后文学史的范围之内，以文学作品为依据概括出来的。质疑者的观点认为：“民间本身并不包含有多少现代性的内容，因为迄今为止的民间文化形态大致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历史上当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国家政统发生冲突时，政统更多的是通过民间发挥作用，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在历史当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深层关系，民间的存在价值就值得考虑。”^②还有人认为：“民间的就意味着传统的和非现代的”，“走向民间则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真正的民间已经成为各种陈旧观念的旧货厂”，“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化像一锅大杂烩，其中煮着全部自发的生机和几千年积淀的陈腐。在这里生机是微弱的，腐朽却因为长期发酵而气味特别浓烈。”^③

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民间”的。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是在文学史范围内，这个“民间”既联系着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又包含着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以及由此所认同的民间审美原则。而质疑者所讨论的“民间”则主要是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现实的空间是丰富、复杂、多样的。既自由自在，又残酷丑陋；

① 参见《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② 陈思和、李振声等：《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③ 李新宇：《泥沼前的误导》，《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既有善的提升、美的升华,又有恶的堕落与欲望的冲动……这些复杂的内容在时代的变化中,在各种文化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又可能发生变化。这个“民间”虽与“民间的文学世界”相联,但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的民间”。那么,应怎样理解“民间”的内涵呢?

我们既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内讨论民间问题,文学的民间内涵自然是思考的核心。我认为下面几个问题应该注意:第一,现实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许多内容不可能全部被文学史包含;第二,文学史上已出现的与“民间”相关的作品,由于作家进入民间的立场不同,其特点也不一样;第三,不管作家以何种立场进入“民间”,都会与现实民间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发生联系,不然就无法获得现实的依托和支撑。由此,从文学史的意义理解“民间”,至少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民间作为现实的自在文化空间(包括民间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容),它的丰富复杂为作家从不同立场去理解和表现它提供了依据,这就必然带来文学作品中“民间”世界的多样性。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看民间,更多关注的是民间的愚昧无知、腐朽麻木;从政治革命立场出发所发现的,可能是民间社会蕴含的现实斗争的巨大力量;从民间价值立场看民间,看到的更多是民间所蕴含的自由精神以及对他们自在生活逻辑的尊重和了解。二是这种种不同的“民间”都与现实的本源性民间相联。那么,哪一种民间更接近民间文化的真相和艺术的根本性问题呢?从现实的民间文化角度看,“民间”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很大的独立自由空间,但是承认现实的严酷性,并不等于否定民间存在着向往自由的本能,也不等于否定民间自身文化、生存逻辑的存在,而且越是在现实中不存在或被压抑的东西,越是在心理上产生神圣、强烈的向往。这可以在大量的民间传说、歌谣、绘画等民间艺术中找到证明。在这里,民间文化并不仅仅指民间物质形态的生活,同样也包含了民间生命的精神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对民间文化自由性的理解,与文学审美的自由性有某种一致性:既

然是在文学史范围内讨论民间问题，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文学审美的“自由”品性是不能忽略的，艺术创作中一旦消失了对于美、自由的追求，艺术也就难以称其为艺术了。另外，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来说，现实的本源性民间所具有的自由自在的生机，有可能通过知识分子的中介，转化为一个自觉的自由艺术世界，这种转化过程必然包含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射。在这里民间的自由自在与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趋向一致，知识分子民间价值立场确立的根本理由就在于此。有了这种民间的立场，不仅使知识分子的精神获得了现实的支撑，而且在文学史研究中，获得了对能够体现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文本的更为真切的把握。

在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艺术的审美原则、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者的联系中，确立了“民间”的核心内涵是“自由—自在”时，又该怎样理解“自由—自在”呢？“自由—自在”既包含生命的自由渴望，又包含民间生存的自在逻辑两个层面：第一，“自由”主要是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生命总有向往自由的本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苦难和不幸，但民间的生命总是顽强地去承担或征服它，生命的这种精神总是或强或弱地弥漫于民间大地之上。这样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现实的民间生活，同时也体现在与民间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中。第二，“自在”则是指民间本身的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等的呈现形态。民间生存的这种自在状态，虽然也受到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及其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但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民间自有民间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发生联系时，从民间的价值立场来说，就是理解、尊重、承认民间的完整、自足，并依据民间固有的价值原则去理解民间的生命与生活。民间文化形态正是以这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质，参与自由的、批判的、战斗的现代文化、文学的构建过程。

当我们确认了知识分子从民间立场所理解的民间文化形态的意义和审美原则时,是否意味着要忽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民间形态(文学史中呈现的民间)的价值呢?显然不能,讨论这一问题的目的恰恰在于:充分挖掘民间文化所具有的“自由—自在”特点对文学史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主要有三种民间理念:一是“五四”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明确提出了“民间”问题,他们所说的“民间”是作为底层的、普通百姓生存的那一文化空间。他们对这一民间文化形态意义和价值的发现,由于立场的差异,表达的内容和对民间的态度也就不同,但在现代文化、文学的范围内,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和意义都与“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性相关。另一种民间理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发展中,从政治革命的立场上,强调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以达到启蒙大众的政治目的。明确提出“民间形式”问题的是向林冰。他在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一民间理念显然是30年代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民间”理念的继续和发展,只不过在提法上更加明确。“民间”所指涉的对象,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转化为“工农兵”和“人民”等,但在内涵上与民间有着同义关系。第三种民间理念是以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的民间观,这些作家把民间文化的价值原则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或者把民间作为灵魂栖息的归宿,或者依据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逻辑去理解民间,进而表达自己对于政治、启蒙、社会文化潮流的认识和态度,比较真实、全面地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生存逻辑和自由生命渴望,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趣味在此获得了完整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一种民间类型,即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化指向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自然具有民间文化的某些特点,但

却明显具有时尚化、流行性的特征，并且与商业文化密切相关，因此，在这种文学类型中，民间文化心理及其审美原则，在商业、市场的引导下，更多表现出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倾向，民间文化中难以在这类作品中体现出参与现代文化构建的积极努力和主动追求，甚至体现出游戏的无聊和媚俗的恶习，因此，本文不拟进一步讨论民间文化形态与通俗文学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内，确立了“民间”的内涵及其对象范围，因此，这一民间理论就成为我们分析与民间相关的各种文化、文学现象的基本出发点。这样，在讨论民间与启蒙、民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知识分子对民间的理解，以及民间的现代意义方面就有了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目 录

| | |
|--------------------------------|-----|
| 引论 “民间”的概念 | 1 |
| 第 一 章 “民间”的现代价值 | 1 |
| 第 二 章 胡适：民间形式的审美活力 | 20 |
| 第 三 章 周作人：在民间与启蒙之间 | 30 |
| 第 四 章 大众化与民间 | 41 |
| 第 五 章 民间形式·民间立场·政治意识形态 | 54 |
| 第 六 章 “十七年”小说中的民间形态及美学意义 | 67 |
| 第 七 章 民间大地的苏醒 | 80 |
| 第 八 章 民间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 | 102 |
| 第 九 章 “桃花源记”与《受戒》、《受活》 | 117 |
| 第 十 章 “太阳山”与《鲁班的子孙》、《泥鳅》 | 128 |
| 第十一章 “动物报恩故事”与张炜的小说 | 139 |
| 第十二章 民间想象原型与近三十年小说创作 | 145 |
| 第十三章 复苏民间想象的传统和力量 | 156 |

附录一 民间与启蒙

——关于九十年代民间争鸣问题的思考 163

附录二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

——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 176

附录三 文学想象力的民间资源 198

附录四 汉语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性”问题 205

附录五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 215

后记 267

第一章 “民间”的现代价值^①

讨论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以及有着怎样的传统等问题,自然不能忽略它与世界文化、文学间的联系,同样不能忽略它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在乡土民间的范围内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的关系,因为具体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乡村民间与他们的精神构成、文学追求有着极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方面,这是与启蒙文学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既然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范围内讨论民间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在何种意义上民间文化形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它所具有的自由批判特征和现实战斗精神,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品格,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价值的理解,也必然与这种文化精神发生关联。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启蒙主题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但也应充分重视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另一内容,即他们在为民间启蒙时,也充分利用了民间

^①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文化资源。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首先从下面两方面开始:一是对来自民间的口语、白话语言的重视;二是始于1918年春的民间歌谣的搜集和整理。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新文学产生的民间文化背景。这一民间文化形态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是与他们的文化启蒙思想和如何建立新文学的现代审美标准密切相关的。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看来,倡导白话文学,一面是“开通民智”,另一面则是“创造中国的文学”。从启蒙和新文学建设的立场出发,对来自民间的白话语言和体现了民间文化的民间文学,从审美的意义上进行了充分肯定。可以说,他们是从“启蒙—民间”的立场解释民间和民间文学的,这是现代作家与民间关系的第一种类型。胡适不仅在文学史研究中,得出民间的白话文学最有生命力的结论,而且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出民间是文学产生的源泉。在此意义上,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对以民间文化形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他们先在1918年春发起征集近世歌谣运动,后于1922年12月创办《歌谣》周刊杂志,专门搜集、发表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和研究、介绍与民间文学相关的文章,从文学的意义上把民间文学纳入了新文学审美标准的构建中。胡适的《尝试集》用民间口语作诗,刘半农模仿家乡四句头山歌的曲调、用江阴方言创作《瓦釜集》,沈尹默、周作人、康白情诗中所流露出的民歌诗韵,都证明了来自民间的艺术因素对新诗建设所起的作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发现了来自民间的语言对新文学的意义,而且还看到了民间文学那种自由、真挚的情感表达方式。刘半农就认为,民歌的长处,全在于它能用“最自然的语言和最自然的声调来表达最自然的情感”。^①“五四”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歌“率性而为、自由表达”情感的肯定,实际上与个性主义的启蒙文化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在民间文化、文学中发现了

^① 洪长泰:《到民间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反抗封建束缚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对自我生命的认同。这种带有个性、自由因素的文学形态被现代作家自觉理解时,就转化成新文化、新文学的内容,与建立在个性主义基础上的“真情自然流露”诗学观融会起来,获得了强有力的现实依托和理论依据,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显然,这些作家从“启蒙—民间”的价值立场理解民间时,发现的是民间文化中与启蒙思想一致的内容,并从审美意义上肯定了民间审美形式的价值。

鲁迅、周作人等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态度要复杂一些,当他们从启蒙立场理解民间时,对民间持二元态度,既强调批判民间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民间蕴含的积极和健康成分。这是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二种类型。从启蒙立场理解民间所持的二元态度,带来了他们理论和小说的两种民间世界:第一,周作人从建设新文学的角度认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同的精灵”。^① 鲁迅在《社戏》中描述了洋溢着田园牧歌风味、自由自在、平等纯朴的民间文化世界,孩子们没有世俗观念,而是合乎自然地生活着,即使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两个字来的。第二,在肯定这一民间时,周作人又认为民歌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思想上都不能让我们满足,文体幼稚,缺少生活的真挚热情。^② 鲁迅则在《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写了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妥协顺从、等级森严的民间生活形态。这两种民间哪一种更接近民间文化形态的本源状态?这种设问本身就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启蒙立场相矛盾,因为他们不是从民间立场认识、理解民间,而是把自己的启蒙思想贯彻于社会文化改造的实践过程中,作品中出现的两种民间形态,实际是从启蒙的不同视角认识民间社会和文化

^①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第16号8版,1923年4月。

^② 参见周作人:《猥亵的歌谣》,《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的结果,前者寄托了启蒙者的社会理想及对民间文化部分内容的认同,后者在现实层面深刻感受到民间文化形态中包含的封建落后内容。在这里,“民间文化”呈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的纯朴、自由自在及其对现实的反抗性;二是其愚昧、麻木与自欺欺人。这二者交织在一起无法简单分开。如何理解这种形态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立场。当鲁迅在现实的民间社会中展开启蒙思想时,两种异质文化必然发生激烈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化与其创作毫无联系,在其小说中必然透露出民间文化对人物的制约。《阿Q正传》中阿Q那句唱词就来源于绍剧《龙虎斗》。绍剧早先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所以绍剧的内容非常符合农民刚直倔强的性格和反抗斗争的意愿。《龙虎斗》这出反映为国除奸、报仇雪恨的戏,在绍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难怪阿Q也能哼上几句,而这唱词也恰好表现了阿Q的原始反抗性格。^①对《祝福》中的祥林嫂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对“鬼”的迷信,而“鬼”、“阴间”的存在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在鲁迅以乡村民间为背景的小说中,民间文化形态始终构成人物形象的精神意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鲁迅认同民间文化的价值立场,他更多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揭示民间文化中包含的非现代性内容。

既然鲁迅没有认同我们说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价值立场,又如何说明鲁迅小说的民间意义呢?我以为在此应作两点辨析:第一,在中国现代启蒙文化中,“自由”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观念,这种“自由”与民间的“自由自在”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在精神向往上有着一致的心理基础,鲁迅在批判乡村民间的非自由性和残酷性时,正是以“自由价值”的确立为前提的,这种启蒙精神的确立也暗含着对民间蕴含的自由精神的肯定,由此才有了《社戏》,有了对阿Q原始反抗精神的描述。有了这种“自由”的渴望,对乡村民间残

^① 参见裘十雄等:《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3页。

酷性现实的描述就愈深刻,也就愈能显现出民间文化精神中“自由”因素的可贵,鲁迅启蒙小说的民间价值正在这里。第二,从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看,如果人物缺少本土的民间文化内容,也就缺少丰富、生动、真实的魅力,因为民间作为底层农民生存的文化环境,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欲求、人生态度无不与此相关。失去了这种“文化”支撑,也就难有人物灵魂的深度。所以,知识分子不管与“民间”有着何种关系,始终无法脱离民间文化形态对其艺术创作的制约。

抗战前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三种类型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民间观。这种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与革命性、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联在一起,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重要内容。从现代历史的发展逻辑看,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完成直接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但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冲突碰撞中,在启蒙还未完成的条件下,便急剧转入社会政治革命。从当时的整体情形看,大部分知识分子由启蒙、文化的立场转向了政治、革命的立场。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李大钊所倡导的“到民间去”和改造民间的理想,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民间文化形态更多的与“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倡导者联在一起。

这种理解民间的方式为文学创作带来哪些新的因素,民间“自由—自在”的文化意蕴与其是怎样的关系呢?对于那些有乡村民间切身体验的作家来说,民间所蕴含的地域色彩、特殊文化意蕴仍旧给他们的小说带来了生动的艺术韵味,有着“政治宣传”本身包含不了的内容。如茅盾的《春蚕》、艾芜的《南行记》等作品就是如此。茅盾的《春蚕》是一篇主题先行的小说,演绎的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江南农村经济破产和蚕农们的悲剧命运。凭阅读感觉,这篇作品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写“蚕农”如

何破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描写是散乱、生硬,甚至干瘪的,造成蚕农破产的外部环境描写也不充分,倒是与这个“主题”没有太多联系的几个农妇的片断描写和老通宝对洋货的仇视心理及企盼蚕宝宝丰收的虔诚更能打动人心。像荷花与六宝的对骂、六宝和多多头的调情,在溪畔、桑川的映衬下,别有民间生活的情趣;老通宝的纯朴、勤快、守旧,也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文化观念相关,比较真实地体现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显然,《春蚕》的审美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主题的深刻”,民间的审美力量在作家的“思想”之外获得了重要意义。在此,我们看到这类作品的“民间”呈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理解民间;二是作家直接感受到的,有着自在形态和自由生存渴望的民间。前者体现了作家所谓的“主题思想”,后者则因其生动、真实决定了作品的美学价值。这样两个层次的民间在许多作品中都交织在一起,特别是40年代初解放区的许多作品,如孙犁的小说、李季的诗还有秋歌剧的改编等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个“民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局限,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一类作品的重要出发点。

沈从文、老舍和赵树理是来自民间,并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文化的三位作家。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四种类型。如果说胡适等人在体现民间文化的民歌中,从“启蒙—民间”立场发现了民间的语言形式及情感表达方式的现代审美意义;那么,沈从文则以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美丽、纯朴的湘西,描绘着那种“自由—自在”、相对活泼、体现着下层人生活情趣和态度的民间世界,他把一种人性的理想融于民间文化形态中,或者说他在民间中发现了这种人性的理想,一种更合理、更严谨的伦理道德标准,他倾心描绘着这种民间形态及其意义的庄严。民族文化形态出现了另外一种特征——纯朴、善良、富有生命的自由活力,这种活力鼓舞着他以自己的天赋赞颂家乡的神话、习俗及原始的仪式,

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贬斥。老舍与沈从文虽然都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去理解民间,但他关心的是民间自在的生存逻辑和自由生活渴望在社会动荡、变化中的呈现形态。所谓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骆驼祥子》中首先体现在他从祥子自身的生存逻辑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出发,去想象、虚构他的艺术世界。老舍自己曾说:“我自幼很贫,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①显然,老舍对祥子的想象和描写正是基于这种没有“绝高见解”的民间生活态度。祥子有自己的生活原则——靠卖力气挣钱吃饭,他不关心战争怎样地毁田,也不关心春雨有无,只关心自己的车,有车就有钱,有钱就有烙饼和一切吃食。这种诚实、勤劳、利己的态度,正是在“土地”上讨日子的农民的生活逻辑,是与几千年的小农意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他狭隘、目光短浅,但对于在战乱、贫困中生存的祥子来说,追求这种起码的生存权力难道不合理吗?这种追求自然也有他对“自由”的理解,这种“自由”就是吃穿住行的满足和不受贫穷折磨的理想。但是这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消失了,他成了一个“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②民间文化所培育出的生存逻辑和梦想,被无情的社会毁灭了。祥子的毁灭既是对社会、市民文化,甚至也包括着对民间文化的批判,但他又在民间立场上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这样一种写作与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或政治立场的写作不同,它从民间的视角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富有本土内涵的艺术世界,也直接启示我们从这一视角重新理解民间文化形

^①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宇宙风》1935年第2期。

^②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